清史纂修（本栏目得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支持）

旧题徐乾学《明史列传》新考

秦　丽

［摘要］ 旧题徐乾学《明史列传》九十三卷并非徐乾学所撰，卷首韩方卓序系后人伪造，抄袭自明末冯梦祯为冯琦《经济类编》所作序文。根据《明史列传》正文内容、版本特征，结合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康熙本王鸿绪《明史列传稿》等综合判断，其应系康熙四十一年至康熙五十三年之间的《明史》列传稿本，是王鸿绪编纂《明史》列传期间较早的工作本之一。对该稿展开分析，有助于更全面理解王鸿绪《明史稿》的成书过程及编纂思路，深化清修《明史》及清代官方史学的研究。

[关键词] 徐乾学　王鸿绪　《明史列传》　韩方卓

[中图分类号] K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5）－03－0175－010

《明史》纂修迁延甚久，在纂修过程中形成了诸多拟稿、校订稿等，它们以稿本、抄本、刻本等形式留存于世。对其成稿、抄写时间进行准确断代，有助于今人深入认识《明史》纂修各阶段的文献特征、文本流变等问题。在《明史》诸稿中，台湾“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台图”）所藏徐乾学《明史列传》尚存有较大研究空间。近年来，李伟敏、南炳文、陈洁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其性质与价值。然该本序文、题识有明显纰漏，其与416卷本《明史》、王鸿绪《明史稿》等《明史》稿本之间关系复杂，学界对该本之真伪、断代、作者等基本问题尚未形成共识。[1]下文拟从该本的基本形态入手，并与其他《明史》稿本相比勘，重判其性质，以期澄清相关争议。

［收稿日期］ 2024-06-15
［作者简介］ 秦丽（1989—　），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天津300350，lilet@aliyun.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朝史学比较视野下的朝鲜王朝明史撰述研究”（20CZS004）阶段性成果。

① 该稿曾收入屈万里的《明代史籍汇刊》（学生书局，1985年）。刘兆祐为该稿所作《叙录》，根据书中韩方卓序，肯定其为徐乾学所撰。李伟敏提出质疑，认为韩序错误丛生，指出该本系后人拼凑、组合416卷本和王鸿绪《明史稿》而成。此后，南炳文等推测韩方卓系清人沈朝初，认为该本系徐乾学所校定之《明史》列传拟稿，在时间上早于416卷本，且与313卷本、416卷本等繁富本相对，属《明史》纂修初期的简练本系统，后为王鸿绪《明史稿》、殿本《明史》所继承。陈洁指出徐氏《明史》在传目编排、内容详略取舍方面显示出其在万稿和王稿之间的过渡性特点。李伟敏：《徐乾学〈明史列传〉辨伪》，《文献》2008年第4期；李伟敏：《抄本〈明史列传〉撰者考辨》，《咸阳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南炳文、魏淑赟：《张廷玉〈明史〉重要拟稿徐氏〈明史〉试探之一——序言作者韩方卓乃沈朝初之号说》，《史学集刊》2016年第3期；南炳文：《张廷玉〈明史〉重要拟稿徐氏〈明史〉试探之二——撰写简练得体张廷玉〈明史〉开路先锋之发现》，《史学集刊》2018年第2期；陈洁：《抄本徐乾学〈明史〉考论》，《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一、《明史列传》的版本形态

旧题徐乾学《明史列传》九十三卷，今藏台图，收入屈万里主编《明代史籍汇刊》、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中。据该馆馆藏著录及黑白胶卷电子文档，知其为朱丝栏写本，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叶心单鱼尾，鱼尾下方刻“明史卷”三字，卷首有韩方卓序、邹福保题识。书中钤印颇多，如“廉普过眼”“玉涵草堂”“陆燿之印”“元和邹氏书库中物”“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等，可见其流传有绪，先后经陆燿（1723—1785）、王成璐（字廉普，1794—？）、邹福保（1852—1915）等人收藏，最终归于台北。[①] 关于该本的外部特征，有几点需要说明：

首先，全书卷末标注“《明史》九十三卷终”，台图著录亦同。细审之可发现其中卷四十五、五十七、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均为上下卷，故总卷数实为九十八卷。另，卷十三《费震传·附张琬传》末页被误置入卷十四《罗汝敬传》后；卷九十三《王象乾传附王象复传》内容不全，与下页不衔接，其后王象云传亦不全，核诸313卷本《明史纪传》、416卷本《明史》，该文稿中间应尚缺王象春、王象坤传。如此种种，当系后世流传中出现的错置或亡佚。从内容看，该本未收后妃传、诸王传及儒林、列女等各大类传，所收人物时代最晚者为万历朝之王象乾、崔景荣、张鹤鸣、赵彦、董汉儒、黄克缵诸人，于天启、泰昌、崇祯乃至南明人物阙如。其次，该本书写工整，但各卷字迹不一，应系多人合作而成；其中多删改、补充等修改痕迹，偶有天头批注。结合前述朱丝栏写本及叶心刻有“明史卷”字样等特征，可判断其版本形态应为誊清本而非后世抄本。最后，书中避“玄”“胤”字讳，如卷四常遇春后人“常玄振”作“常元振”，卷二十铁铉之“铉”字缺末笔，卷八十一张佳胤、卷九十三王与胤“胤”字均作“胤”；而不避“真”“丘”“夷”等字讳。由于“胤”字避讳约始于康熙四十年左右，而雍正三年十二月下令避“丘”字讳,[②] 故根据这些避讳特征初步判断，知其大致应撰于康熙四十年（1701）之后至雍正四年（1726）之前的时间段。

二、所谓“韩方卓序”辨伪

台图本《明史列传》卷首韩方卓序明言“《明史》九十三卷，司寇健菴徐公乾学所手辑也”，成为判定其系徐乾学所撰的直接依据。然诚如李伟敏所论，序文提及徐氏殁后其门生韩菼代为整理遗稿，徐氏卒于康熙三十三年，序文落款作“康熙甲辰”（康熙三年），时间显误。另外，韩方卓生平除曹梦元《昆山殉难录》卷首存“娄湄韩方卓序”外别无可考。

进一步考究序文本身，发现其乃抄袭自明末冯梦祯为冯琦《经济类编》所作序。冯序既见于冯梦祯《快雪堂集》，又见于《经济类编》卷首，二者文字有异，今将三序择要罗列如表1。

① 笔者所见徐本《明史列传》有台图馆藏本黑白胶卷电子文档和《明代传记丛刊》收录本两种，然后者将原书底色及钤印尽抹，因此涉及钤印时文中将以黑白胶卷本为准，其余部分则以《明代传记丛刊》本为准。

② 江庆柏：《明诗综版本考》，《嘉兴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清世宗实录》卷39，雍正三年十二月庚寅。

表 1　冯梦祯《经济类编》序与韩方卓《明史列传》序对比表

《快雪堂集》卷二冯序	《经济类编》卷首冯序	《明史列传》卷首韩方卓序
《**经济类编**》百卷，故大宗伯临朐**冯公琦**之所手缉也。	《**经济类编**》百卷，故大宗伯临朐**冯公琦**之所手缉也。	《**明史**》**九十三卷**，司寇健菴**徐公乾学**所手辑也。
公钟海岱之灵，凭诗礼之泽，弱冠登甲科，**选入木天**。姿貌魁梧，文章尔雅，人以公辅期之。时词馆所储，俱南北名流，余幸滥竽。每相聚，则议论嘻笑，笔舌纵横，而公独埋锋戢颖，挠之不乱。昼常阖扉静哦，人莫测其浅深，而材誉日起。无何，余以狗马疾放归，不预，散馆。又三年，出补史局，齿于十人者，而与公周旋益亲。余齿视公十年以长，**馆中称大小冯**，而公之才名蕴藉，深沉博大，余又何敢望其万一。	公钟海岱之灵，凭诗礼之泽，弱冠登甲科，**选入词馆**。姿貌魁梧，文章尔雅，人以公辅期之。时词馆所储，俱南北名流，余幸滥竽。每相聚，则议论嘻笑，笔舌纵横，公独埋锋戢颖，挠之不乱。昼常阖扉静哦，人莫测其浅深，而材誉日起。无何，余以狗马疾放归，不预，散馆。又三年，出补史局，齿于十人者，而与公周旋益亲。余齿视公十年以长，**馆中称大小冯**，而公之才名蕴藉，深沉博大，余又何敢望其万一。	公钟海岱之灵，凭诗礼之泽，弱冠登甲科，**入词馆**。姿貌魁梧，文章尔雅，人以公辅期之。时馆所储，俱南北名流，余幸滥竽。每相聚，则议论嘻笑，笔舌纵横，而公独昼常阖扉静哦，埋锋戢颖，人莫测其浅深，而材誉日起。无何，余以疾放归，不预，散馆。又三年，出补史局，齿于十人者，与公周旋益亲。余齿视公十年以长，**馆中称公才家**，而公之才名蕴藉，深沉博大，余又何敢望其万一。
公沉敏端亮，遇事镇静，策其成败多验，有经济实用，卓然台鼎之望，文章特其余事。**小试于乡会，文衡表策诸作出公手，必藉甚一时，与代言之文、编摩之史，俱称大手笔**。长春官数年，几至宣麻而寝，不得展其大用，士论惜之。	公沉敏端亮，遇事镇静，策成败多验，有经济实用，卓然台鼎之望，文章特其余事。**然尝衡文乡会，出公门者多，名世士表策诸作出公手，必藉甚一时，与代言之文、编摩之史，俱称大手笔**。自少宰长秩宗，几至宣麻而寝，不得展其大用，士论惜之。	公沉敏端亮，遇事镇静，策成败多验，有经济实用，卓然台鼎之望，文章特其余事。**然尝衡文游会，出公门者甚多，名世士表策诸作出公手笔，允足以上追班、马而非时手所能及**。
公没无几，而是编出于**公弟民部郎瑗，盖主于经济而杂采秦汉已下鸿儒著作、名臣奏对，旁及百家杂猥**，为类二十有三目，俪之凡三百余条。	公没无几，是编出于**公弟民部郎瑗，盖杂采秦汉以下鸿儒著作、名臣奏对，旁及诸子百家呟议眇论有关经济者**，共成之。自帝王至杂言，为类二十有二目，俪之凡三百余条，几三百万言。	公殁未几，是书出于**公弟果亭先生，盖上自洪武，下迄启祯，井井鳞鳞，靡不毕备，诚一代之良史哉**。
因忆在馆时阖扉静哦，是编实托始矣，公真有心人也。**然此编主于议论，文彩采摭或有未尽，条件亦有重复**，以备帐中之藏，未协不刊之典。整齐厘次，存公手泽，则**公之门生侍御周公、仁和令吴公有功焉**，而受其成于郑生。	因忆在馆时阖扉静哦，是编实托始矣，公真有心人也。**第公用世蚤而蚤世**，即是书亦未竟之绪，藏之帐中者，整齐厘次、存公手泽，则**公门侍御周公、明府吴公及郑生之惠与有功焉**。	因忆在馆时阖扉静哦，是编实托始矣。公真有心人也。**第公用世早而早世**，即是书亦公未竟之绪，其时为之整齐鳌次，以存公手泽者，则**公门状元韩菼实有功焉**。
方今同馆诸君子死亡略尽，而余幸以湖山备鲁灵光，则序公斯编，非余又谁？**乃受吴明府之简**，而引其端如此。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不胜凄感。	同馆诸君子死亡略尽，余幸以湖山备鲁灵光，则序公斯编，非余又谁？乃受**吴明府之简**，而引其端如此。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不胜凄感。	余幸以湖山备鲁灵光，则序是书者非余而谁？**乃受果亭先生之简**，而引其端如此。是书亦公未竟之书也。
万历甲辰嘉平之吉，真实居士序于孤山别业之青岩居。	**万历甲辰**嘉平之吉，真实居士冯梦祯序于孤山别业之青岩居。	时**康熙甲辰**春吴门韩方卓撰。

资料来源：冯梦祯：《快雪堂集》卷 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164 册，齐鲁书社,1997 年，第 58–59 页；冯琦：《经济类编》卷首，国家图书馆藏万历三十二年吴光义、郑之惠刻本，馆藏号 15370；旧题徐乾学：《明史列传》卷首,《明代传记丛刊》第 89 册，明文书局，1991 年，第 3–9 页。

由上可知，韩序在序文结构和文字表述上脱胎于《经济类编》卷首冯梦祯序，而非《快雪

堂集》。韩序仅简单变更书名、人物、时间等少量信息，如将“经济类编”改为“明史”、“冯琦”改为“徐乾学”、“冯梦祯”改为“韩方卓”、“冯瑗”变为“果亭徐秉义”、“万历甲辰”变为“康熙甲辰”等，适当润色文字，改头换面，炮制出完整交代《明史列传》形成渊源的文字。至于为何韩方卓抄录《经济类编》而非《快雪堂集》序文，实因前者乃实用易得之类书。其低劣的作假手段，导致序文出现不少匪夷所思的错误，如前述徐乾学已卒与康熙甲辰的矛盾，以及强调徐乾学出身“海岱”（今山东）等。韩序将二冯之交游经历嫁接到韩方卓与徐乾学身上，诸如韩氏出入史馆的时间、经历等，全出自二冯万历二十二年（1594）共同修史时的经历。[①]这种照搬不假思索、未经核实，不符合徐乾学生平轨迹，但由于其内容、细节过于具体，隐蔽性、欺骗性极强，如未看过冯氏原序，易让人误以为这是序文作者韩方卓的亲身经历，进而误导对该序文及徐乾学修史经历的认识。

序文所述具体经历既非真，其首句所言该《明史》为徐乾学所撰，是出于何种原因，又是否可信？笔者认为序文乃抄袭而来，可信度自然不高。但要想弄清这一问题，需将序文和正文部分分开看待，回归史稿正文具体考察。此详后文第三部分。这里先考察“韩方卓”的情况。

南炳文论及，“韩方卓”一名仅见于两种文献，一是台图本《明史列传》，二是明末清初曹梦元所著《昆山殉难录》。前者署名“吴门韩方卓”，后者落款“娄湄韩方卓”。吴门、娄湄均为苏州地区代称，故二者应系一人。既然无法从《明史列传》序文中提取到韩氏的真实身份，《昆山殉难录》亦仅有韩氏署名而未透露具体生平，仅知其为苏州人。不过，《昆山殉难录》的抄本时间或可提供一些线索。

《昆山殉难录》今仅存台图所藏的清抄本，该本被收入《明代传记丛刊》和《昆山历代人物志》中影印、点校出版。该本卷首有徐秉义《殉难录叙》、曹梦元自序和韩方卓序，徐、韩二氏继台图本《明史列传》序文后再次同时出现。其中，徐序上钤有“季振宜印”“丰润张镇”二印，即该稿分别经清康熙朝泰兴季振宜、同治朝丰润张镇收藏。季氏为清初著名藏书家，卒于康熙十三年，[②]而徐秉义序落款时间是康熙十九年，晚于康熙十三年，故“季振宜印”系造伪无疑，其书既未经季氏收藏，也就无法证明其为康熙初抄本。事实上，学者对比道光《昆新两县志》卷三七《艺文》所收徐序与今传抄本徐序，发现后者系修改删润前者而来，由此判断“此书钞本必为道光以后之钞本”。[③]此说是。

回到台图本《明史列传》，在全书正文所有可考钤印中，年代最早者为“陆燿之印”白文方印、“朗甫”朱文方印。陆氏为乾隆时苏州人，字朗甫，官至湖南巡抚。在该印为真的情况下，知该稿正文在乾隆年间已流传于世。而反观韩方卓序上所盖钤印，自上而下依次为“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朱文长方印、“廉普过眼”白文方印、“玉涵堂珍藏”朱文长方印，序文末有“玉涵草堂”朱文方印。假设诸印均真，“玉涵堂”“玉涵草堂”应属同一人之斋号，查明弘治进士苏州人吴一鹏有故居云“玉涵堂”，此处钤印或其清代后人所盖亦未可知，而“廉普”系道光年间官员王成璐之字。从既有信息看，该序最早的收藏记录很可能是在道光年间，这样的时间节点恰与《昆山殉难录》发生交集，亦即两部载有韩方卓序的书籍同时出现于道光前后。因此可推断“韩方卓”活动于道光年间或稍前，而这也符合嘉、道、咸以来明季文献渐次复出的时代背景。综上，所谓“韩方卓”或系使用假名之乌有先生，或系嘉道时期名叫韩方卓的苏州本地文人或书商，他熟知当地乡贤、名人及其师承关系，特别对徐乾学为代表的徐氏家族相对了解，

① 李小林：《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3–16、21–23 页。

② 潘天祯：《潘天祯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208 页。

③ 吴航：《〈增订晚明史籍考〉补遗》，《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2 年第 8 期。此外，徐秉义的《培林堂文集》卷 3（《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13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65–66 页）亦收该序，文字较《昆山殉难录》抄本及道光《昆新两县志》均为多，且无落款时间。

故可在获得该书后，伪造序文并正确书写相关人物关系。书商造假乃习见之现象，此或一证也。

另外也需留意书中的邹福保题识。邹氏为清末著名藏书家，此稿中多有“元和邹氏书库中物”印，知该稿曾经邹氏收藏。就内容而言，李伟敏指出该题识存在前后矛盾处，即邹氏声言其于光绪丁酉年（二十三年，1897）初见该稿，题识落款却是丙申年（二十二年）五月，不合逻辑。事实上，该段文字仍存其他疑点。一是关于邹氏购书时间。即使两个时间点发生颠倒，邹氏于光绪二十二年购书的可能性仍较小。邹氏于光绪二十年迁司经局洗马，二十三年补授翰林院侍讲，并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其间一直旅居京师，①而售卖该稿的书商侯念椿在苏州开设有世经堂书肆，主要活动于苏州，二人客观上不具备见面条件。“侯念椿以《明史列传》示予，共六十五册……予留阅旬日……商之至三，竟以银饼千枚易之”，②此书凡65册，卷帙浩繁，价值贵重，二人又经反复商量，图书交易恐难以邮寄方式进行，交易的完成似要到次年邹福保丁母忧返乡之后更合理。二是该序文字体与今存邹氏字迹不符。邹福保作为清末著名书法家，尤擅行楷，今存多幅书法作品真迹。细审其《自祭文》《青霞仙馆古今体诗初稿》《听秋阁诗存》等作品，笔力遒劲浑厚，而《明史列传》题识细笔孱弱，二者书风迥异。③基于此，我们怀疑至少题识字迹应非邹氏所书；另一方面，侯念椿是清末苏州著名书商，与叶昌炽、缪荃孙、叶德辉等名人来往密切，且光绪二十二年仍在世，故题识所言侯念椿售书邹福保事或确有其事。此外，邹福保于民国四年（1915）去世，不久邹家败落，其次子邹百耐星散图书以纾家难，后亦成江南著名书商。④不排除该书流入市场后，书商为提高售价题写伪识的可能性。

三、回归文本：台图本《明史列传》的基本性质

由前文可知，台图本《明史列传》序文、正文彼此割裂，序文系后世假造，正文情况如何，此节予以重点关注。前已述及，根据文稿中避“玄”“胤”字的避讳特征及其稿本形态看，该本大致撰于康熙四十年之后、雍正四年之前。而徐乾学卒于康熙三十三年，故文稿与徐氏无直接关联，这也符合其著述和传记资料从未提及此稿的事实。

下文从具体文字、传目设置等方面对比该稿与其他各明史稿。比勘对象有：国家图书馆藏313卷本《明史纪传》（简称313卷本）、旧题万斯同416卷本《明史》（简称416卷本）、王鸿绪《明史稿》（简称王稿）、殿本《明史》。王鸿绪“《明史》稿本”今存《明史列传残稿》六册、康熙五十三年《明史列传稿》和雍正元年《明史稿》全本三种，后二者列传规模分别为208卷、205卷，虽总体相差不大，但行文内容、卷次分合仍存不同。今为确定台图本《明史列传》成书下限，特以国家图书馆藏康熙抄本《明史列传稿》为准比勘，辅以《明史列传残稿》。⑤

针对这些明史稿间的关系，李伟敏指出台图本《明史列传》系后人从416卷本《明史》和王鸿绪《明史稿》两稿诸臣传中各自抄录一部分组合而成，其所列传主和内容均在二书范围之内。⑥但台图本实有溢出于二稿之外者。试举例如下。

---

① 李峰主编：《苏州通史·人物卷（中）·明清时期》，苏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85页。

② 旧题徐乾学：《明史列传》卷首，第89册，第10页。

③ 徐钢城：《巢隐老人邹福保别集稿本据录》，《收藏家》2016年第4期。

④ 邵妍：《百拥楼主人邹百耐遗事及贡献》，沈乃文主编：《版本目录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318页。

⑤ 据侯仁之、黄彰健研究，在王鸿绪康熙五十三年进呈《明史列传稿》之前，还有王鸿绪手订本《明史列传残稿》六册。该本今藏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笔者无缘得见。下文根据侯、黄二文征引之《残稿》原文略作探讨，尤其关注书中王鸿绪所撰朱、红、墨、淡墨诸色批注文字。就现有研究看，傅图本《残稿》内容与台图本《明史列传》交叉者较少。侯仁之：《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明史〉刊成二百年纪念》，《燕京学报》第25期，1939年；黄彰健：《〈明外史〉考》《续记》，《明清史研究丛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365–420页。

⑥ 李伟敏：《抄本〈明史列传〉撰者考辨》，《咸阳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其一，台图本卷二十铁铉传后附宋参军，其言“宋参军者，不知何许人。燕师攻洛南不克，舍之南去。参军说铉直捣北平，铉以卒困甚，不果。后不知所终”。[①] 检 313 卷本、416 卷本，铁铉传后均未言及宋参军，而王稿《铁铉传》仅言“宋参军不知所终”。[②] 因此，台图本的这部分内容不可能抄自以上三书。其二，台图本卷八十五钱一本附子春传：“帝刮地湖广为福王庄田，数不足则不遽之国，春三疏力争。”[③] 其中“数不足则不遽之国”一句有删除痕迹。查 313 卷本、416 卷本，钱一本传后未附钱春传，无该句，而王稿《钱春传》正为删后之表述。[④] 设若台图本因袭王稿，怎会无中生有，编造出“数不足则不遽之国”复删去？管见所及，此处删落者并不见于台图本以外之文献，应系该文稿撰写者独立写就，非抄自他书。

综上，台图本《明史列传》绝非简单抄撮 416 卷本《明史》、王稿而成的伪本，而是确属明史纂修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稿本，有其独特之处。陈洁的《抄本徐乾学〈明史〉考论》是目前针对台图本《明史列传》的最新研究。该文认为，《明史列传》在传目编排、内容详略等方面显示出在万稿、王稿间的过渡性特点。其说可从。不过，其所言“万稿”包括 313 卷本、416 卷本两种，而以 313 卷本为主比勘，某种程度上模糊了二者在文本和时间上的差异。此二稿不能完全等量齐观。譬如 416 卷本设有《外戚传》，并为后来的王稿、殿本《明史》继承，而 313 卷本并无此传。又如，416 卷本无孙如游传，313 卷本中其与刘一燝、韩爌、朱国祚、何宗彦同传，王稿、殿本亦有孙氏传。具体到二者与台图本的关联，可见以下数条。首先，416 卷本卷一六四为蓝玉传，附曹震、张翼、张温等六人传记，这样的处理与台图本相同，而在 313 卷本中，曹震等人与蓝玉同为独传。再者，416 卷本卷一八〇收录人物全同台图本卷十七，即叶旺附马云、蔡迁驸陈文、缪大亨、何文辉、徐司马、金兴旺附费子贤、花茂等 17 人。二书对马云、陈文、费子贤这些附传人物的描述与 313 卷本大体无异，但 313 卷本未将这些人物体现在传目中。种种差异表明康熙中期熊赐履领衔修订的 416 卷本，在前期 313 卷本基础上，在传目设置、人物收录等方面做了许多调整和改造。[⑤] 而台图本所参考者正是后出的 416 卷本。这种参考是有选择地加以吸收。例如，台图本卷十六为钱唐、茹太素、冯坚、韩宜可、李仕鲁、曾秉正、叶伯巨、郑士利、周敬心、王朴诸人传记，其《钱唐传》详于 313 卷本、416 卷本，且传后附程徐传，而在 313 卷本、416 卷本中，程徐单独立传，后来王稿、殿本钱唐传后均附程徐。

至此，可判定台图本《明史列传》纂成于 416 卷本之后，后又为王鸿绪所用。关于王稿对台图本《明史列传》的参考利用，陈洁已有充分论述，但未涉及王稿编纂初期的《明史列传残稿》和王鸿绪康熙本《明史列传稿》。此处结合二稿，举数例稍作说明，见表 2。

第一条王肯堂传中，由于 313 卷本、416 卷本均无王氏本传，康熙本《明史列传稿》的相应内容几乎全同台图本，二者的密切关系可见一斑。

第二条王来传中，传记起始部分 416 卷本记载最详，将其幼时立毁丛祠、倜傥不群的个性描写得绘声绘色。台图本略做删节，但保留了大致情节。康熙本《明史列传稿》则删去这一轶事，直叙其仕宦经历。事实上，这在今存《明史列传残稿》中有直接反映。该稿王来传“闻有丛祠为祸福，立往毁其祠，识者异之”一句上有朱笔批注：“查实录事迹如何。”[⑥] 此处《明史列

① 旧题徐乾学:《明史列传》卷 20，第 89 册，第 741 页。

② 王鸿绪:《明史列传稿》列传第二十八，国家图书馆藏康熙五十三年敬慎堂本，第 4 册，第 2b 页；雍正元年敬慎堂刊本同。

③ 旧题徐乾学:《明史列传》卷 85，第 94 册，第 286 页。

④ 王鸿绪:《明史列传稿》列传第一百十一，第 17 册，第 12b 页；雍正元年敬慎堂刊本同。

⑤ 王宣标:《熊赐履与〈明史〉纂修》,《史学史研究》2014 年第 1 期。

⑥ 侯仁之:《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明史〉刊成二百年纪念》,《燕京学报》第 25 期，1939 年，第 224 页。

传残稿》原文全同台图本，批语则显示在首崇实录的方针下，王鸿绪最终删去了这一细节。

表 2　416 卷本《明史》、台图本《明史列传》、王鸿绪康熙本《明史列传稿》对比举例

	416 卷本《明史》（收入《续修四库全书》）	**台图本《明史列传》**	**王鸿绪康熙本《明史列传稿》**
王樵传附肯堂	卷三一八 无	卷七十七 子肯堂，字宇泰。举万历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博览群籍，声著馆阁。倭寇朝鲜，疏陈十议，愿假御史衔练兵海上。疏留中，因引疾归。京察，降调家居。久之，吏部侍郎杨时乔荐补南京行人司副，终福建参政。肯堂好著书，尤精于医，所著《证治准绳》，该博精粹，世竞传之。	列传第一〇二 子肯堂，字宇泰。举万历十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博览群籍，声著馆阁。倭寇朝鲜，疏陈十议，愿假御史衔练兵海上。疏留中，因引疾归。京察，降调家居。久之，吏部侍郎杨时乔荐补南京行人司副，终福建参政。肯堂好读书，尤精于医，所著《证治准绳》，该博精粹，世竞传之。
王来传	卷二一三 王来，字原之，慈溪人。父尹和，知金溪县。来幼倜傥不群，随父之官，闻有丛祠能为祸福，笑曰："奚有是哉？"立往碎其象燔之，毁其祠，识者异之。宣德二年，以会试乙榜授新建教谕。	卷四十三 王来，字原之，慈溪人。父尹和，知金溪县。来幼倜傥不群，闻有丛祠为祸福，立往毁其祠，识者异之。宣德二年，以会试乙榜授新建教谕。	列传第五十一 王来，字原之，慈溪人。宣德二年，以会试乙榜授新建教谕。
石亨传	卷二一七 时尚书于谦主号令，新定战格，临阵有进无退，将不顾军先退者，掌令官立斩其首；军不顾将者，后队斩前队。由是诸将惕息，无敢不受约束。寇首薄彰仪门，都督高礼等却之。	卷四十二 时尚书于谦主号令，新定战格，诸将惕息。寇薄彰义门，都督高礼等却之。	列传第五十 时尚书于谦主号令，新定战格，诸将惕息。寇薄彰义门，都督高礼等却之。
孙原贞传	卷二一三 附薛希琏传	卷四十三 附孙需、张宪、杨瓒传	列传第五十一 附孙需、张宪、杨瓒传

第三条石亨传中，同样是 416 卷本叙述最细致，台图本和王氏康熙本《明史列传稿》稍加删节，二者内容全同。此外，在王氏《明史列传残稿》中，"时尚书于谦主号令，新定战格，临阵有进无退，将不顾军先退者，掌令官立斩其首；军不顾将者，后队斩前队。由是诸将惕息，无敢不受约束"一句有墨笔批注："此见谦传"，即该文字已见诸于谦传，此处无须复述，故改作"时尚书于谦主号令，新定战格，诸将惕息"。[①] 可见《明史列传残稿》删节后的文字正同于台图本、康熙本。因此，台图本显然吸收了《明史列传残稿》的部分修订意见。

第四条孙原贞传的篇次分合，416 卷本原附薛希琏传，到台图本和康熙本《明史列传稿》中，替换为附孙需、张宪、杨瓒诸人传记。《明史列传残稿》原文同附薛希琏传，删订者删去薛传，以孙需、张宪代之，[②] 这符合从 416 卷本到台图本的文本变动，台图本吸收《明史列传残稿》的修订意见，又增加杨瓒作为附传，此后为康熙本《明史列传稿》继承。

综上，台图本《明史列传》的撰成时间可明确定位于康熙四十一年至五十三年之间，处于

① 侯仁之：《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明史〉刊成二百年纪念》，《燕京学报》第 25 期，1939 年。

② 侯仁之：《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明史〉刊成二百年纪念》，《燕京学报》第 25 期，1939 年。

熊赐履416卷本《明史》及王氏《明史列传残稿》之后，康熙五十三年本《明史列传稿》之前。衣若兰推测，《残稿》很可能是王鸿绪于康熙四十八年归田后的改稿，若此则可将成书时间进一步缩小至康熙四十八年至五十三年间。① 从内容看，台图本《明史列传》与今存王鸿绪的《明史列传残稿》《明史列传稿》存在密切关联，其性质是王鸿绪纂修《明史》时的工作本之一，是王氏《明史稿》的过渡形态。

四、台图本《明史列传》的学术价值

前文梳理了台图本《明史列传》的基本情况，特别是考证其性质及在系列“《明史》稿”中的位置，这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首先，台图本《明史列传》有助于增进对《明史》纂修进程的认识。《明史》纂修素为学界所重，台图本作为纂修过程中的重要稿本，无疑有助于推进该问题的研究。王鸿绪《史例议》云，“史馆原稿，立传过多，今删其十之四，然犹未免于瓜分豆剖也”，② 其《明史稿》在传记分合上大力删削裁并，单篇传记亦趋简化，过去学界多以王鸿绪《明史稿》为《明史》由繁转简的关键节点。南炳文以台图本徐乾学《明史列传》为据，认为其特点是力求简洁，开《明史》纂修初期简洁本系统之先锋，与之相对的是以313卷本、416卷本等为代表的繁富本系统，由此形成简洁、繁富系统并立说。③ 经本文论证，台图本与徐乾学无甚关联，且其成书要晚至康熙末年。而此本之外，包括天一阁藏《明史稿》、复旦大学藏《明史列传稿》等早期稿本均大量征引实录、奏疏等，呈现出传文繁富、篇幅较大的特点，因此，目前发现的《明史》诸稿似不足以支持康熙中前期纂修中存在简洁本系统。

其次，台图本有助于全面理解王鸿绪编纂《明史稿》的过程及其特点。过去学界针对王氏对《明史》的贡献，在《史例议》之外，往往关注到雍正初敬慎堂刊本《明史稿》、康熙五十三年本《明史列传稿》，较少提及康熙本《明史列传残稿》。本文考订台图本《明史列传》为王氏批点本，至此，王氏编纂《明史稿》的今存文稿增为四部，为我们认识王氏数十年间纂修《明史稿》的前后过程、修订细节、文本变化等提供更完整的拼图，有助于丰富对王氏史学以及《明史》在康熙末期纂修情况的认识。这里试举例说明。

台图本曾省吾传传末载：“(王)篆最险猾，无士行，其他给事、御史傅作舟、王蔚、秦耀、李选、朱琏、顾尔行为居正爪牙，及湖广巡抚陈瑞辈皆小了纤人，无足道也。”④ 此段文字脱胎自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王篆与曾省吾益横南北，给事、御史则傅作舟、王蔚、秦舜翰、李选、朱琏、钱岱、顾尔行为之爪牙，而作舟、琏尤恣肆，选鄙无耻，人所羞而不道者。”⑤ 台图本借王世贞之论，不仅对这些人物做出品评，也交代了删除或不收其人传记的原因。到416卷本《明史》曾氏传附朱琏、王篆传，王鸿绪《明史稿》梁梦龙传附曾省吾传，再到殿本《明史》已删去曾氏传。汪由敦曾批评王鸿绪《明史稿》张居正传“其中描写热闹处，皆弇州笔”。⑥ 此处台图本文字正出自王世贞，这佐证了汪氏之论，体现出王鸿绪对明末私家史书的重视和利用。

又，台图本传记多无论赞，这基本符合王鸿绪《史例议》“今《明史列传》未经作论，体同

① 衣若兰：《史学与性别：〈明史列女传〉与明代女性史之建构》，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4页。

② 刘承幹：《明史例案》卷2，徐蜀主编：《〈明史〉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29页。

③ 南炳文：《张廷玉〈明史〉重要拟稿徐氏〈明史〉试探之二——撰写简练得体张廷玉〈明史〉开路先锋之发现》，《史学集刊》2018年第2期。

④ 旧题徐乾学：《明史列传》卷74，第93册，第461页。

⑤ 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8，国家图书馆藏万历四十五年刻本，第8册，第19a页，馆藏号19300。

⑥ 衣若兰：《史学与性别：〈明史列女传〉与明代女性史之建构》，第35页。

《元史》”[1]的主张。但书中仍偶存论赞，应属删而未尽的情形。是书卷十六《钱唐传》有论曰：“稗史言高帝废孟子配祀时，诏有敢谏者，金吾射之。（钱）唐抗疏而入，袒胸受箭曰：‘臣死有余荣。’帝鉴其诚恳，命医疗其疮，配祀得不废。所传或过当，然唐之强谏，固赫赫在人耳目也。其尊崇圣教、匡救主失，良足多矣。”[2]在今存《明史》诸稿中，这段论赞独见于台图本，后续王稿删之，进一步践行了其不作论赞的主张。这也说明王鸿绪当时有大量可资参考的列传底稿，经过对它们的修订调整，逐渐形成了其完善的雍正本《明史稿》。此外，陈洁文中提到台图本在处理建文诸臣时姑著存疑的做法，[3]尽管不符合王氏《史例议》及后来《明史稿》对相关野史的摒弃态度，却是王稿动态修订过程的又一体现。

最后，台图本《明史列传》提示我们，《明史》稿的流传与研究史同样值得关注。《明史》纂修中形成了大量分纂稿、进呈稿，以及工作本、誊抄本，史馆如何保存这些成稿，康熙后期被王鸿绪携归乡里的文稿又有怎样的流传轨迹，后世学者何时开始重视《明史》诸稿本，如此种种，从学术史角度考察明史稿的“发现”与研究史，十分必要。事实上，《明史》诸稿受到学人广泛关注，乃是20世纪以后的事，其中尤以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为著。而在早期的传播史中，这些稿本是否一定经名人收藏、手订，需审慎判断，避免陷入攀附名人的误区。据前文考证，台图本较早的收藏记录是在乾隆年间，而所谓韩方卓序的出现很可能晚至道光以后，只有弄清这一点，剥去名人“徐乾学”的笼罩，还原文稿本身的生命过程，才能对其做出正确的判断。再如，复旦大学本《明史列传稿》原为乾隆时吴骞所有，据其跋文，当时邵晋涵在西湖书局校书时曾借阅并保存多年，用于《余姚县志》等的纂修，由此，王欣夫判定其为“余姚邵晋涵手校”，“全书朱笔校勘谨严，圈点到底，验之皆邵氏笔”。[4]此或存疑。查该书第20册陆完、王琼、张子麟、李鐩卷，天头朱批云：“内王琼有才有功，似不宜与张、李同传”，[5]这里的“似不宜”显然是某文稿修订者在工作中的意见，不可能是乾隆中后期读者视角的表达，且313卷本、416卷本王琼传设置与该本同，而王鸿绪《明史稿》、殿本《明史》均作出调整，王琼不再与二人同传，足见该批校文字很可能对文稿后续修订产生了影响。又，第51册王威附子世钦、朴洪等人卷，天头朱批云：“王氏父子殊无战绩，不足列传，世钦附入忠义，朴于松山之战附载可也。”[6]王威父子，在416卷本及之后的王稿、殿本中均未立传，在有官方定谳殿本《明史》的前提下，邵晋涵不可能再细究传目的设置与调整这类问题。因此，复旦本与邵氏之关系仍待考证。在《明史》诸稿本的研究中，类似问题应予以重视。

五、余论

台图本《明史列传》作为一个典型个案，为深化《明史》诸稿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思路。目前学界发现和利用的《明史》稿本，包括天一阁本《明史稿》、313卷本《明史纪传》、416卷本《明史》、复旦本《明史列传稿》、台图本《明史列传》、王氏《明史稿》及其《残稿》、殿本《明史》、《四库全书》本《明史》等，不排除未来继续发现新本的可能。面对这些《明史》稿本，如何确定其编纂阶段至关重要，这不仅关系到文献学的问题，更涉及对其背后史学意义的把握。本文的研究提示我们，针对这些文稿的考察，需从文献载体和文献内容两个维度，并结合

---

① 刘承幹纂：《明史例案》卷2，《〈明史〉订补文献汇编》第30页。

② 旧题徐乾学：《明史列传》卷16，第89册，第576–577页。

③ 陈洁：《抄本徐乾学〈明史〉考论》，《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④ 王欣夫撰，鲍正鹄、徐鹏整理：《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未编年稿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69、1570页。

⑤ 复旦大学本《明史列传》，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第20册，第1页。

⑥ 复旦大学本《明史列传》，第51册，第1页。

《明史》纂修历程综合研究和考虑。所谓载体，包括文献的外在版本特征（稿本或抄本、避讳字等）、递藏关系（序跋、藏书印、字体）；文献内容则是诸稿本的文字对勘。在此前提下，精准定位，审慎解读，方能得其真谛，加深对清修《明史》及清代官方史学纂修细节的理解，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References

Chen Jie. "Chaoben Xu Qianxue Mingshi kaolun" (A Study on the Manuscript of Xu Qianxue's Ming History). *Jiangsu shifan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1 (2023).

Li Xiaolin. *Wanlichao guanxiu benchao zhengshi yanjiu* (Research on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Wanli Dynasty). Tianjin: Nankai daxue chubanshe, 1999.

Nan Bingwen, and Wei Shuyun. "Zhang Tingyu Mingshi zhongyao nigao xushi Mingshi shitan zhiyi: xuyan zuozhe Han Fangzhuo nai Shen Chaochu zhihao shuo" (On History of Ming Written by Xu Qianxue)". *Shixue jikan* (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Studies) 3 (2016).

Nan Bingwen. "Zhang Tingyu Mingshi zhongyao nigao xushi Mingshi shitan zhier: zhuanxie jianlian deti Zhang Tingyu Mingshi kailu xianfeng zhi faxian" (History of Ming Written by Xu Qianxue: the important *Draft of History of Ming* Written by Zhang Tingyu). *Shixue jikan* (Collected Papers of History Studies) 2 (2018).

Wang Xuanbiao. "Xiong Cilü he Mingshi zuanxiu" (A Study of Xiong Cilü and the Compiling of *Mingshi*). *Shixueshi yanjiu* (Jouranl of historiogrphy) 1 (2014).

Wu Hang. "Zengding wanming shijikao buyi" (Supplement to the revised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Tushuguan lilun yu shijia* (Lib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8 (2012).

Yi Ruolan. *Shixue yu xingbie: Mingshi lienvzhuan yu mingdai nüxingshi zhi jiangou* (Historiography and gender: biographies of women in Ming His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omen's history in the Ming dynasty). Taiyuan: Shanxi jiaoyu chubanshe, 2011.

A New Study of Xu Qianxue's *Biographies of Ming History*

QIN Li (School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lilet@aliyun.com)

Abstract: The 93 volumes of the "Biographies of Ming History" inscribed to Xu Qianxue in "Taipei National Library" were not written by Xu Qianxue. Han Fangzhuo's prefa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ook was forged by later generations and plagiarized from the preface written by Feng Mengzhen for Feng Qi's "Economic Classificatio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iographies of Ming History," combined with Wang Hongxu's "Biographies Fragmentary Manuscript of Ming History," and the Kangxi version of Wang Hongxu's "Biographies Draft of Ming History", it should be a draft of the biographies of "Ming History" between 1702 and 1714 during Emperor Kangxi's region, which was one of the earlier drafts during Wang Hongxu's compilation of the "Biographies of Ming History." Analyzing this manuscript will help us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the "Ming History," more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process and compilation of Wang Hongxu's "Draft of Ming History," and deepen the research on "Ming History" and th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of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Xu Qianxue, Wang Hongxu, Biographies of Ming History, Han Fangzhuo